

# 日本作为一种状况

## ——关于调和普遍与特殊的思考

俞佳儒

### 引言

在对日本的研究中，存在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两种研究取向。前者强调日本的特殊性，而后者则倾向将日本看作普遍性下的某种表现。而在多元普遍主义的视野下，日本的相关情况也会被看作“多元”中的一元而参与到普遍主义的建成中。<sup>①</sup>

无论是特殊主义还是普遍主义，都只是认识和研究日本的一种方式，而非公认的定式，且各自都存在一定内在的局限性。事实上，二者的局限或许有着同一起来源，即将“日本”进行本质化从而固定住研究对象；而“日本”本身应该是流动的。在时间维度上，不同历史时期的日本有着不同的地域范围，也有着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在空间上，不仅同一时间点日本内部亦有差异，而且日本研究也很难仅局限于日本国内部（例如海外日本人社群研究等）。笔者希望讨论一种以状况为中心的日本研究取向，在对二者加以调和的基础上试图对它们进行一定的补充。

### 一、人类社会中的特殊与普遍

在进入状况中心的日本研究前，笔者希望首先指出的是，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并非泾渭分明，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类基本的社会生活。因此，对于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的调和是可能的，甚至是必要的。

---

<sup>①</sup> 例如“全球国际关系学”（Global IR）把日本看作外围的一部分而呼吁关注其国际关系理论贡献，参见阿米塔·阿查亚和巴里·布赞：《全球国际关系学的构建：百年国际关系学的起源和演进》，刘德斌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

社会生活离不开特殊。特殊往往是具体，它有着明确的边界和内涵，它的功能是区分。每个人都是特殊的人，我们可以明确地将我与你、我与她、你与她做出区分，也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人。因此，当我们说“爱身边具体的人”时是有明确指代的，尽管在具体使用的过程中我们不一定会穷尽“身边具体的人”这一集合，但这一集合是“可以”被穷尽的。

但是纯粹依赖于这种具体和特殊的“社会”是不存在的。社会的基础是交往，而交往则需要**最低限度**的共识，即“你我都是人”。这种共识本身是一种想象，因为如果仅关注每个具体和特殊，总能找出二者之间哪怕分毫的差异。“人类”的范畴也依赖于这一共识，每个人不可能遇见世界上所有人，但很少有人会因此拒绝认为自己所知范围以外也存在人。总之，这一共识提供了普遍主义的叙事，将生物学上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生物概括为“人”，或者说“人类”。它发挥的是聚合的作用。<sup>①</sup>

也就是说，当我们谈到“人”时，即有具体和特殊意义上的人（小写），也有抽象和普遍意义上的人（大写）。<sup>②</sup>无论抛弃哪一种认识方式，都有可能走向危险的深渊。当我们仅仅以特殊的视角来认识人，那么个体与个体之间就失去了交往的基础，许多维持秩序的社会规范也就不可能存在。例如“不可以杀人”的基本共识在纯粹特殊的世界中就不可能存在，因为除了“我”以外就不存在其他的“人”。而纯粹普遍意义上的人则失于对人具体境况的关怀，会为了所谓“人类利益”而**命令**他人做出牺牲。当代某些左翼知识人就有这样的倾向。

## 二、特殊与普遍的层次性及其问题

然而上述分析是理想化的。在现实世界中，具体特殊的人和抽象普遍的人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层次。例如，儒学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如果我们把天下看作人类的范围，那么在“身”和“天下”之间至少还有“家”与“国”。西田几多郎在《善的研究》中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历史的发展就是从人的自觉、家

<sup>①</sup> 因此，这里所讨论的普遍主义并非后现代和后殖民立场所批判的西方普遍主义。正如酒井直树批判的那样，西方的普遍主义其实是“自我宣称的特殊主义”，只不过以普遍主义的面目示人。参见 Naoki Sakai, “Modernity and Its Critique: The Problem of Universalism and Particularism,” in Masao Miyoshi and H. D. Harootyan eds., *Postmodernism and Japan*,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98.

<sup>②</sup>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说的“自利”和在《道德情操论》中强调的“同情”其实就沟通了特殊与普遍的两种“人”。斯密的道德哲学深受斯多亚学派的影响，因而“同情”其实也颇有世界主义的意味。

庭的自觉、社会的自觉、国家民族的自觉最后到达人类的自觉。<sup>①</sup>首创世界主义的斯多亚学派亦有类似的同心圆观点。<sup>②</sup>

这些层次影响了我们对于研究对象的看法。以日本人论为例，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于“日本人”和日本性（Japaneseness）的同质性假设，包括：1）所有日本人都有相关属性；2）日本人在这些属性上没有程度差异；3）这一属性是日本独有的；4）这一属性与历史无关。<sup>③</sup>在这里，个人具体是如何的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作为日本人的一员会是怎样的。梁顺（Sonia Ryang）指出，这样的假设是假象，而且忽视现实的权力关系，因而这样的论述被她称为“国家人类学”。<sup>④</sup>“国家人类学”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是它将一国之人看作集体自我，<sup>⑤</sup>二来它是现实中权力为巩固自身而塑造的产物。

其实，从国家内部来看，国家人类学提供的是普遍主义的叙事，它将具有差异的个体人统合为一个国家/民族；但是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它恰恰是一种特殊叙事，因为它将国家与其他国家做出了区分。这样的分析完全适用于个体人与人类之间的每一个层次，当我们将这些层次的“主体”看作分析单位时，均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与国家人类学类似的问题。

但国家层次往往受到更多关注，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现代政治生活。国家理由、国家主权、民族主义现代政治理念等不仅限定了主流国际关系学的本体论，还对人类学等学科产生了影响（如梁顺所说的国家人类学）。笔者无意争论国家的权利（right）是否是虚假的，但必须要承认的是，国家主权绝不是本质的（natural）。因而国家主权的行使范围，即领土空间也不应是本质的。法国社会理论家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所谓的“空间的生产”充分展示了这一点，而且他还指出了空间生产与政治的关联。<sup>⑥</sup>加文·沃克（Gavin Walker）和酒井直树（Naoki Sakai）所认为的地区（area）与领土（territory）的区别就建立在空间政治的基础上。<sup>⑦</sup>

<sup>①</sup> 西田几多郎：《善的研究》，何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142-143页。

<sup>②</sup> 参见陈玉聃、王欣：《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一个中国式的世界主义理念》，《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3年第12辑，第12-34页。

<sup>③</sup> Yoshio Sugimoto, *An Introduction to Japanese Society (Fourth Edition)*,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3-6

<sup>④</sup> Sonia Ryang, *Japan and National Anthropology: A Critique*,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p.140.

<sup>⑤</sup> Ibid, p.198.

<sup>⑥</sup> 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sup>⑦</sup> Gavin Walker and Naoki Sakai, "The End of Area,"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Vol.27, No.1, 2019, pp.1-31.

因此,当我们选择研究对象时,必须意识到研究对象的边界并不一定是天然自成的。<sup>①</sup>当我们试图研究日本时,必须认识到“日本”这一概念的范围是可以质疑的。从外部来看,日本本身并不是完全自成一体体系,历史上它深受经由百济而来的大陆文化的影响。也就是说,虽然历史当然存在于日本的内部,但即便是孤悬海外的岛国,其历史也是被编入(woven into)地区史、交通史、海域史甚至全球史中的。从内部来看,不仅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冲绳的琉球原住民很难被完全统合到“日本人”的大范畴之下,就是日本其他都道府县之间的边界也并非是天成的。<sup>②</sup>更何况,无论在哪一个地域内部,都还有性别、阶层、族群、代际等不同的差异。

这样看来,由于各种中间层次分析单位的边界具有模糊性和建构性,因而当我们以日本为对象进行研究时,不仅面临自下而上的特殊性要求,还面临着自上而下的普遍性要求。向下,日本研究的“普遍性”可以层层拆解为特殊;向上,日本研究提供的特殊叙事也需要被编入更为普遍的叙事之中。在这样的双重压力下,如何看待我们的研究对象,如何选择我们的研究视角和取向,这些问题就变得尤为重要。无论是选择特殊主义的取向还是选择普遍主义的取向,往往都会遭到对方的批评,而且这一选择具有与日本实力地位相关联的时代性。<sup>③</sup>何种时代的日本研究更加偏向何种范式,这本身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然而在这样的争论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不同取向的研究成果?特殊主义取向的日本研究是否果真与一般理论无缘?一般理论有在多大程度上无法契合日本现实呢?而在上文对“日本”进行一定的解构之后,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日本并不是孤立和自成体系的,那么我们在研究“日本”时,我们究竟在研究什么呢?

也就是说,特殊与普遍两种研究取向之争表面上看是对研究视角和范式的争

---

<sup>①</sup> 法国的路易十四追求“天然疆界”,但所谓天然疆界也不过是一种政治性的建构。

<sup>②</sup> 更为明显的例子其实是中国各省市区的划分。周振鹤曾指出,中国历代行政区划边界的划分遵从两个原则:“山川形便”和“犬牙相入”。由于“山川形便”下的地方行政区易守难攻,容易催生地方势力坐大,因而需要从中央层面进行“犬牙相入”的调整,这一原则在唐以后愈发明显,在元朝达到极端化并在明清时期恢复平衡。参见周振鹤:《中国历史政治地理十六讲》,北京:中华书局 2013 年版,第八讲。从今天的视角看,江苏、贵州等省份其实并不自成一体,特别是江苏省南北差异较大,甚至在语言上也完全分属不同方言区。也就是说,国内所谓地区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政治塑造的产物。当然也并非所有边界都完全没有现实和自然的基础。

<sup>③</sup> 参见青木保:《日本文化论的变迁》,杨伟、蒋藏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8 年版;青木保「日本文化の現在」、『世界の中の日本Ⅲ:文化研究という視点—日本研究の総合化について—』、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1991 年、49-73 頁。

论，但其实它与研究对象的选取也不无关联。如果能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日本研究，或许能够对特殊和普遍两种范式的差异与共性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 三、状况中心：对普遍与特殊的调和

#### 1、状况中心的日本研究

笔者主张将“日本”看作状况（condition），并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日本研究。在这里，状况指的是人在其中进行活动的条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人是条件规定的存在（conditioned beings），并尝试从哲学思辨、更为普遍的角度对人的积极生活（vita active）进行反思。<sup>①</sup>尽管在思想上无法企及阿伦特的高度，但笔者期望从状况出发重新理解日本研究。

状况中心的研究并不仅仅研究状况中的条件，其落脚点更应该在状况下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本身就是状况的一部分，阿伦特认为人虽然在条件中活动，但其活动同样改变条件，因此人的活动尤为重要。那么状况中心的日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就是恰好在日本发生的状况，以及这一状况下人的活动。

因此，与其说日本是一种状况，不如说日本只是容纳状况的一个场所。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日本内的状况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数的。历史上的日本存在着不同的状况，而同一时间点的日本也存在不同的状况。这些状况并不一定扩散到整个日本，但一定反映了某时某地的具体状况。不同的学科可能会识别出不同的状况，例如政治学的制度主义可能会把日本官僚制看作状况中的活动，并探寻这些活动背后的条件；行为主义可能会把官僚制看作一种状况，而去观察官僚们的行为；社会学则可能会把上京的学生面临的租房压力、求职困境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因素看作条件，而去研究学生的活动的模式。

其次，状况可以无视主权边界。主权的边界不是本质的，因此状况的识别并不会以主权边界为必要因素。例如，当我们希望探讨壬辰倭乱间对马岛人在朝日和谈中间的角色时，这一状况范围就超出了当今日本国的主权边界。葛兆光教授曾力推的“从周边看中国”学术议程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有时状况的范围可能会与日本主权的范围一致，例如法社会学的相关研究，由于日本的法律仅适用于日本，因而也很难超出其主权范围。总之，日本的主权边界对于状况的存废没

---

<sup>①</sup> 参见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版。

有决定性意义。

状况中心的研究还有另一个前提假设,即人具有最低限度的普遍性,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条件。因此,不必为自己研究的状况局限于日本,甚至局限于日本某地而感到焦虑,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人的活动,那么我们的研究结论必然具有一定的普遍含义。这些普遍含义并不需要研究该状况的研究者明说,研究者需要做的最低限度就是细致考察这一状况,并提出在这一状况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这种在状况内普遍、状况外(或状况间)特殊的解释可以就这么(そのまゝ)放在那里,因为如果它具有扩展到其他状况的普遍含义,那么它就可以唤起其他研究者的共鸣,并形成状况间的对话,以“零星工程”(波普尔)的方式形成对知识的贡献。

简单来说,这种状况中心的有两个核心关切。一方面,状况中心的日本研究希望突破日本主权的藩篱,使研究对象在空间上更为灵活,以此保留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另一方面,以状况为中心的研究期待对“人类”普遍性的关怀,在时间和空间上与“人类”发生关联,审慎地为一般理论作出贡献。

## 2、状况中心与其他研究立场

### 1) 区域国别研究与学科研究/理论研究

状况中心的研究可以与很多不同的研究分类产生共鸣,它可以说是区域国别研究和学科研究的中间地带。区域国别研究的问题在于固定了研究对象,对于区域国别的过分执着有时会束缚研究者的手脚。<sup>①</sup>而学科研究往往从理论问题出发且以理论问题为导向,实证材料是为理论而服务的。这有时会让研究者忽略具体现实,为了理论而过度裁剪实证材料。状况中心的研究不歧视对区域国别现实的详细描述与梳理。但它超越了由政治力量划定的边界,<sup>②</sup>能够让研究者关注到更为细致和具体的问题,而不是局限于区域与国别的宏大层面。

状况中心的研究也不反对对学科理论研究的追求,但它要求理论从状况出发,

---

<sup>①</sup> 丸山真男提出“对象主义”和“方法主义”的对立,参见丸山真男:《评贝拉的〈德川宗教〉》,贝拉:《德川宗教:现代日本的文化渊源》,王晓山、戴茸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附录三,第260页。在这里,区域国别研究可以说是对象主义的。

<sup>②</sup> 由于国家的边界不是天然的,因此由国家加总而成的区域的范围也就不是天然的。例如,所谓东南亚很大程度上就是建构的产物。近年来兴起的“印太”等概念也反映了类似的情况。又例如,新清史等流派欣赏内亚视角,也证明了所谓东亚也不是完全自成体系的。这些所谓区域的界定背后均透露着一定的政治意涵。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也认为,历史上东亚的体系并不自成一体是因为与南亚体系有所重叠,需要考虑互动,参见 Amitav, Acharya “Before the ‘West’: Recovering the Forgotten Foundations of Global Order,”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20, No.1, 2022, pp.265-270。

而不是让状况削足适履。在这里,状况和案例或许存在一定的相似性。彭佩尔(T. J. Pempel)曾梳理了日本国别案例与比较政治学一般理论进行对话的方式,包括理论检验和理论生成两大类型,理论检验中又包括理论证实、理论修正、理论否定三种子类型。<sup>①</sup>他的讨论建立在问题导向型研究的立场上,特别强调带着理论来观察日本案例,或者带着“为什么”的问题进入日本研究来建立理论。<sup>②</sup>这种方式类似边燕杰总结的“想问题,究理论,重证明”的理论导向实证研究,<sup>③</sup>也是当今社会科学界较为通行的方式。状况中心的研究同样强调状况对于理论的贡献,带着明确的理论问题进入状况当然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状况中心的研究并不排斥没有明确理论困惑的状况梳理,但一定需要为状况中人的活动提供一套叙事。例如杰拉德·柯蒂斯(Gerald L. Curtis)的《日本式选举运动》(*Election Campaigning Japanese Style*)运用“日式白描”的手法描绘了一位政治家的选举运动过程,虽然没有提出清晰明确的理论命题与框架,但事实上展现了选举政治学中一些命题的因果机制。<sup>④</sup>范·埃弗拉在其著名的定性研究方法教材《政治学研究方法指南》中指出,理论建立可以借助当事者或旁观者对所经历的事件试图给出的解释,<sup>⑤</sup>柯蒂斯的工作为他经历的事件提供了解释,因而是具有理论潜力的。与柯蒂斯一样进行述论结合也好,<sup>⑥</sup>在述后进行初步阐发也好,关键是需要在对状况中人的活动进行描述的同时提供便于其他研究者进行共鸣的素材。

状况中心提倡对状况间进行比较,但也不否认单状况研究的合理性。比较能够产生理论,但是对单一状况的精彩描述也可以提供理论的土壤。根据高柏的分享,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本是比较中国改革开放和日本四十年代末两国分别从计划/管制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但被中村隆英指出没有可比性。<sup>⑦</sup>最后高柏的论文聚焦到了30-60年代日本发展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及其对政策的影响(三个政策范式),同样取得了不错的理论效果。

<sup>①</sup> T. J. ペンペル「比較の視座から見る日本政治——日本のどこが本当にユニークなのか」、日本比較政治学会編『日本政治を比較する』、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5年、44-63頁。

<sup>②</sup> T. J. ペンペル「比較の視座から見る日本政治——日本のどこが本当にユニークなのか」、47-48頁。

<sup>③</sup> 边燕杰:《理论导向的实证社会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15年第2期,第12-23页。

<sup>④</sup> Gerald L. Curtis, *Election Campaigning Japanese Style*,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贺平:《国际日本研究述论》,未出版文稿,第140-142页。

<sup>⑤</sup> Stephen Van Evra,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26.

<sup>⑥</sup> 贺平:《国际日本研究述论》,未出版文稿,第142页。

<sup>⑦</sup> 高柏:《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日本研究——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高级培训班讲习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8-19页。

## 2) 本国研究与外国研究

园田英弘将日本研究区分为“作为本国研究的日本研究”和“作为外国研究的日本研究”，其背后隐藏的一个争论是：究竟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能对日本有更好的理解。<sup>①</sup>作为中国学生，我们的研究也就自然被归入了“外国研究”之中。而桑山敬己则讨论了“书写者—被描述者—读者”的三角结构，并区分了古典民族志、过渡期民族志和完全本土型民族志等不同的民族志研究类型，<sup>②</sup>更加丰富了本土和外来的区分。

但状况中心的研究立场不过分强调本国与外国的区别，因为它秉持着人具有最低限度的普遍性这一假设。以日本研究为例，当我们阅读对日本某时某地经历的状况进行的研究时，或许会因自身所处的状况而对其产生共鸣。这种共鸣就是在人具有最低限度的普遍性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的，因为我们认识到在日本的状况中活动的也是人。更具体而言，这种共鸣基于对于状况相似性的感知和人类普遍性的观点而产生。这时，日本是本国还是外国已经不重要，关键在于我们能从状况中读出什么经验，并加以回答我们自己身边的问题。

## 3) “作为方法的”方法

“作为方法的”方法在东亚学术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从日本竹内好的“作为方法的亚洲”和沟口雄三的“作为方法的中国”，到中国大陆孙歌使用的“作为方法的日本”“作为方法的根据地”等表述，再到中国台湾地区陈光兴所使用的“亚洲作为方法”等，此外韩国历史学者白永瑞等也对“作为方法”进行了呼应。

其实，“作为方法”所提倡的方法更加偏重研究视角，例如“作为方法的中国”强调从中国内部出发来理解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不是借用西方的“近代化论”等论调来评判和展望中国历史。但是如前文所说，状况中心的研究强调把日本、中国、韩国、东亚等作为状况发生的场所，这是从研究对象的角度出发的。当我们把研究对象转化为状况以及状况中的人，那么我不仅可以从状况外部来观察，也可以如“作为方法”的立场一样从状况内部进行观察，这时或许就可以看作是

---

<sup>①</sup> 園田英弘「自国研究としての日本研究・外国研究としての日本研究——二つの日本研究の協調的競争の可能性——」、『世界の中の日本Ⅰ：日本研究のパラダイス—日本学と日本研究—』、国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1989年、253-272頁。

<sup>②</sup> 桑山敬己：《学术世界体系与本土人类学：近现代日本经验》，姜娜、麻国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第22-26页。



“作为方法的状况”。因此，状况中心的研究和“作为方法”方法是可以融合的。

### 3、通过《开国》看状况中心的研究

笔者认为，丸山真男的论文《开国》体现了状况中心的日本研究的一些核心特征。丸山论文开篇第一句就指出，“开国”“可以指代某种象征性事态，也可以理解为对一定的历史现实描述”。<sup>①</sup>这意味着，开国这种状况不仅是日本幕末维新时期具体的事实，同样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即日本在室町晚期到战国时代、和战败后都面临了开国的状况。在这里，丸山提出了开国对于日本历史的有限普遍意义，并将这种有限的普遍意义作为借幕末维新讽今的基础。例如，在明治初年社会忽然开放而产生了一定道德混乱的情况，而这种混乱中性的混乱和黑市的猖獗是比较突出的现象。事实上，在战后初期的日本，当道德权威突然凋零，色情和黑市同样是“道德焦土”中的常见风景。<sup>②</sup>

但是，这种普遍意义绝不仅限于日本。在世界的某处同样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况。这需要其他研究者发现，并对《开国》一文产生共鸣。面临社会开放带来的道德失序阵痛，政府选择了复活传统的道德教育（例如颁布《教育敕语》）。事实上，其他历史时期的其他一些威权或转型初期国家，面对开放社会带来的道德失序阵痛，同样会选择对传统道德教育的复活。这些状况之间就产生了共鸣，我们能够知道在这些状况下，人很有可能会进行这样的行动。那么接下来可以尝试研究其他类似幕末维新时期开国的状况，从状况内部给出解释并在状况的比较中得到更为深刻和精确的理论见解。

### 四、余论

至此，笔者讨论了一种以状况为中心的研究，它将研究对象从国别（日本）转换到状况和状况下人的活动。状况中心的日本研究希望调和日本研究中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两种研究取向之争，但并不试图取代它们。事实上，状况中心的视角同样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看待过去这些研究的方式。在上文中，笔者已经通过柯蒂斯、高柏和丸山真男的相关作品展现了这一点。

笔者认为，与其对相反取向的研究进行相互“嫌弃”，不如通过状况的视角

<sup>①</sup> 丸山真男：《忠诚与反叛》，路平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57 页。该文集中的另一篇论文《幕末认识方式的变革：以佐久间象山为例》同样体现了类似的特征。

<sup>②</sup> 参见小熊英二：《民主与爱国》，黄大慧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 年版，第一章。

重新发掘对方研究的意义。对于特殊主义取向的研究来说，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当我们剔除其中执拗的特殊论和例外论，或许就可以发现一种相对客观的状况和状况中人的活动，并通过状况中的人提供的最低限度的普遍性来获得理论意义。而对于普遍主义取向的研究来说，日本是其理论“应验”的一个案例，它同样提供了一种解释，如果我们能够将削足适履过程中被忽略的部分补上并重新加以评判，亦能发现其中的优点。总之，状况的视角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但是状况中心的研究在操作中仍然会遇到问题。例如，以状况作为研究对象会遇到如何确定状况范围的难题。状况突破了某些清晰的边界，但也付出了边界模糊的代价。这时我们或许可以借鉴“液态的区域”（liquid area）的区域研究方法/理念。“液态的区域”认为区域产生的唯一机制就是人类的活动，而人类的活动具有流动性，因而区域是液态的。<sup>①</sup>对于同样重视人类活动的状况研究而言，通过人类活动来界定状况或许是一条可能的出路。但具体的操作应该有怎样的要求，是今后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最后，状况中心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参与到今天对的区域与国别学建设的讨论中。状况中心的核心关切解构了区域和国别本体论的绝对性，对研究人员选取研究对象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状况的视角下，研究人员不能把自己的研究领域简单定义为“日本研究”“东南亚研究”，而是需要围绕着某个主题不断发现新的状况或者发掘没有被充分研究的旧的状况，这其实要求研究人员对于某个区域或国家有更加细致和深入的了解。此外，状况视角更加要求区域与国别学形成学科学术共同体。状况可能是跨国和跨区域的，且区域本身就可能相互重叠，<sup>②</sup>因此东一榔头西一棒式地建设研究中心事实上很难穷尽值得研究的状况。形成区域与国别学的学科共同体，可以加强跨区域研究的交流。例如研究恐怖主义的状况，可能需要中东研究、中亚研究和西北边疆研究等多个领域的通力配合。如果中东研究、中亚研究的研究中心和重镇分属不同城市和省区，且没有学术共同体提供平台，那么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的前景可能会相对黯淡。

总之，状况中心的研究视角希望为日本研究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提供一条调和特殊主义和普遍主义及它们相关成果的可能途径。最重要的是，状况研究强调

---

<sup>①</sup> Tessa Morris-Suzuki, "Liquid Area Studies: Northeast Asia in Motion as Viewed from Mount Geumgang," *Positions: Asia Critique*, Vol.27, No.1, 2019, pp. 209-239.

<sup>②</sup> Ibid.

状况中人的重要性，这恰恰是主流国际关系学界容易忽视的。

附记：

状况的英文是 **condition**。**condition** 可能是自然的，往大了说我们住在地球上，现在也没有能力进行超光速旅行，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一个 **condition**。往小了说，黄土高原的黄土、东北平原的黑土、青藏高原的冻土都是 **condition** 的组成部分。但是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带来这样一个趋势：**condition** 会从前面所使用的名词变成动词，意为制约、加条件于。我们越来越多地被政治权力规训，从而陷入权力所规定的状况之中。一个极端案例即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在其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描绘的“制约”（**conditioning**）。事实上，研究本身也是状况中人类的活动，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意识到政治性 **conditioning** 的存在并尽可能地摆脱。